

甲午以前国人对现代化先决条件的探索

李怀印

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包括许多方面,政治方面的前提条件是一个关键点。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所强调的首先是一批现代化的“干部”亦即领导力量的形成,以及政治权力从传统领导阶层向现代领导阶层的转移。其次,当权力转移之后,新兴现代国家能不能制订一系列有助于启动现代化进程的恰当政策,并采取相应的制度化措施,使之成为持之以恒的长期国策,这对日后的现代化进程,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把创造现代化先决条件化为具体的行动,是甲午以后的事。在甲午以前,一直停留在人们的言论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的30多年间,人们对现代化先决条件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本文拟对这一过程作一初步考察,并从中梳理出一个大致的演进脉络。

(一)

晚清人士对现代化先决条件的朦胧意识,是在19世纪70年代中叶的海防筹议过程中初步形成的。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了结后,清廷饬令沿海沿江督抚筹议海防,就“练兵、筒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6条各抒己见。当时,不少封疆大吏都把“用人”和“持久”两条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如,有的说这两条是6条中的“要领”,“持久一条,尤足挽救时弊”,“用人一条,尤为万事之根本”。^①有的说,六事当中,前四条只是末,“用人,持久,其本也”。^②所谓用人,这里是指选拔、造就

一批为时代所需的人才。所谓持久,则是使一系列因应时局变化的政策措施制度化、经常化。可以说,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阶层第一次触及现代化的先决条件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看,晚清统治集团内部那些对决策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是从哪些地方着手,来解决“用人”和“持久”问题的?

当时有一种保守的主张,认为用人问题的解决,毋需寻找什么新的途径,只要照老办法去做就行。例如山东巡抚丁宝楨、江西巡抚刘坤一、湖南巡抚王文韶、湖广总督李瀚章,均持这样的观点。与这些人相比,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思路。他摆脱了中国人千百年来因循不变的“在传统内变革”的思维模式,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向陈腐的用人制度——科举制开刀的必要性。

李鸿章认为,在近十多年来的洋务活动中,之所以找不到既精通兵略、又熟谙洋法的人,是由于不学之过,而“下不学”又是由于“上不教”。现在,文才武将的选拔,依然沿用章句、弓马的老办法,然而这些旧玩艺根本不能应用到洋务方面,两者之间“隔膜太甚”。因此,李鸿章郑重提出了改革科举的建议。他说:“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主能速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③

李鸿章以其显赫的身份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在当时的确算是惊世骇俗之举。因为

科举制度自从唐宋以来一直是历代王朝录用官吏的最主要途径，它到了近代，便犹如一道堤坝，在抗拒着现代化浪潮冲击的同时，保护着一群传统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当李鸿章试图在这条大坝上打开一道缺口时，传统主义分子将会怎样地惊慌和反抗。事实上正是在保守派的一片攻讦和咒骂声中，1875年6月，总理衙门不得不宣布：“设科等事，势难急行”。^④不管怎样，从现代化先决条件的角度看，改革科举制的主张所具有的意义，毕竟是有限的。相比之下，身为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倒是能够以不寻常的胆识，在更大程度上触及“用人”问题的实质。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让工商业者问政的人。

郭嵩焘在提出自己的主张时，先把中西方商人的不同处境做了个比较。他说：“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相比之下，中国工商界人士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阂，不少华商巨富因担心清朝官吏的敲榨勒索，不敢打出自己的旗号，而甘愿挂洋商的牌子，做外人的附庸。因此，在郭嵩焘看来，目前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急通官商之情”，消除官商之间的隔阂，保护商人的利益，“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让商贾们在政坛上有说话的权利。如果不这样做，“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查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⑤

郭嵩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样的主张，是需要付出惊人的勇气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现代工商业者亦即民族资本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尚未形成，“四民”等级观念在社会上依然普遍流行。在这种背景下，郭嵩焘居然把位于“四民”之末的商贾，提到参与国政的地位上，这给传统势力所带来的震撼，便可想而知。

关于如何“持久”的问题，一般疆吏所提意见，几乎都流于空论，没有什么实质性

的新内容。包括李鸿章，在这一点上也没有拿出什么新招，只是要求“办事之人同心协力，后先相继，日益求精”，云云。相比而言，郭嵩焘的观点，就要显得具体得多，也全面得多。他全然不顾清廷拟议的“六条”的限制，在推“中外情形所以异同”之后，提出四条带有现代化总纲性质的统筹全局的意见。

首先是在政治上“急通官商之情”。这条对策的具体内容，前面已作了介绍。值得指出的是，郭嵩焘把它放在四条之首，敢言他人所不敢言，足见他对时局的替变和历史潮流具有多么深刻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见识。

其次在经济上“通筹公私之利”。强调国家要向西方学习，“以保护商贾为心”。如在海运方面，官方不该与商贾争利，最好设立一个“市舶司”，其首领由商人公举，三年一易。

其三，国防上“兼顾水陆之防”。在他看来，无论李鸿章这样的东南海防派，还是左宗棠那样的西北塞防派，均失之偏颇。在制订国防战略之前，首先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只有在全面深入了解了国际局势之后，才能制订一个适当的防御计划。

第四，“先明本末之序”。这里，郭嵩焘总结了自己对现代化先决条件（“本”）的看法。在他看来，制订因变对策时，应知道哪些是根本性的、最重要的，哪些是被决定的和次要的。郭嵩焘以历史为鉴，指出“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比起边防来，健全和更新政治体制，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上下一心，和衷共济，这才是根本之图。即使在边防当中，也有本末之分。所谓练兵、制器、造船、理财，都是末，“用人”才是本。只要朝廷“念念以培养人才为心，邪正公私较然不能掩”，那么士大夫的精神就会焕然一新，吏治之功效亦必日新月异。^⑥

（二）

近代中国人在认识现代化先决条件的道路上，是走得相当艰难的。李鸿章的思想在

当时算是相当出格了，郭嵩焘又比他更进一步。但他们的认识，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毕竟只能做到“浅尝辄止”的地步，见诸纸面的主张，更显得小心翼翼。然而，在现代文明浪潮的侵袭下，任何传统主义堡垒如果不甘愿被冲毁和淹没的话，都必须作出某种创新性回应和调整。近代中国人正是这样。1875年8月，就在郭嵩焘上奏后不久，清政府任命他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以此成为近代中国对外派遣常驻使节的开端。随着时代的发展，晚清士大夫对现代化先决条件的认识，也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化。1879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所发表的政论，在这一时期的士大夫言论中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从他的政治主张中不难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

罗应旒的现代化方案包括如下五点：

第一，“整学校以新吏治”。罗氏认为，现今的吏治已坏到极点，“庸劣贪墨无处无之。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这并不是因为举劾不严，整顿不力，而是人才太少，称职者难。进一步推究，则是由于在陈腐的科举制度下，“学校之未究真学，选举之未得真才，任用未能各适其长而尽辨其贤否耳。”所以，刷新吏治、培养人才的根本办法，是改革科举和用人制度，“学校振则根本立矣”。具体做法，可以把京师太学和直省书院改为“经世书院”，让那些有志于经世之学的举贡、生员做学生。一旦进院，即完全抛弃时文、诗赋这些浮而不实的东西。学成后，即由掌院和督抚视其才之大小保奏录用。“其有通达古今政体、人才识远，兼通各科之长而足以胜大任者，则渐用为卿贰、司道，以为大臣之选”。另外，院中还要聘请“西学师”，讲授物理、数学、力学、电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学成者可以任用到机器、船政各局，“荣以禄位，与部臣等”。这里，罗氏还特别指出，凡是学习“西学”的学生，不一定要从举、贡、生员中录选。只要他们能知文义、具巧思、有志于学，就可以收进来。“内有通达政体、身备圣贤之学者，仍可任以尚书、侍

郎、督抚、卿贰、司道之职”。

罗应旒的上述政治变革设想，从根本上突破了“在传统内变革”的模式。传统政治体系赖以运作的基础——科举考试制度，在这里已经被架空，失去了原有的实质性意义。崭新的经世书院教育体系，成为推动政治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蜕变的有力机制。这套改革方案，实质上是一个大胆的试图使清朝统治阶层从上到下“大换血”的计划。

第二，“练兵民之武艺以自强”。这里所讲的，是有关军事制度的改革设想，包括八旗、绿营的改革以及训练“民兵”等具体项目。罗氏特别强调民兵训练的重要性，认为“训练既成，偶遇缓急，随时随地皆调集百万劲军，尚何虑强邻之蓄谋不轨哉？”罗氏的这一设想，在某种程序上不免流于空想。因为这些用“长矛、大刀、短刀、枪炮”武装起来的农家子弟、妇女，能否敌过列强的洋枪洋炮，实在令人怀疑。不过，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这种植根于悠久历史传统的军事思想，又不无一定的合理性。如果人们联想到这种全民皆兵的做法，事实上一直延伸到现代的话，那么，传统与现代的微妙关系，在这里是不是更值得人们玩味吗？

第三，“精机汽之器械以利用”。罗应旒强调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呼吁社会有志之士真心实意讲求机器、重学（即力学）、算学、化学和电学。同时认为国家应该招集商人，兴办公司，从事铁路、电线、机器、船政等各项建设。对于有新发明、新创造的人，还应该仿照西方国家的做法，赏给五等爵位，给以世职。以上所讲，实际上是一套经济现代化方案。

第四，“参西国之法例以谋远”。这里除了建议改革治狱制度和工匠管理制度之外，重点强调，向国外派驻使节，以保护华侨利益。他认为，这方面应该从长远着想，“不心拘泥中国体制”。

第五，“握朝野之利权以储费”。罗氏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使中国的工业化尽快启动的

粗略设想。这一设想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为其出发点。他说，中国历来偏重礼乐教化，“富强所不屑为也”。但现在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势力正日益膨胀，中国受害不浅。如果再不行动起来，掌握本国利权，听任洋人噬之、夺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那么，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自操利权”呢？罗氏指出这样几点，即开采矿藏、振兴民族工业、发展远洋运输、实行关税保护措施等。^⑦

(三)

进入19世纪80年代，传统中国社会与外部文明之间的接触和碰撞，显得比以往几十年更加频繁、剧烈。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晚清中国社会，正处在一种突变性的大动荡前夜。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如此，思想文化领域也不例外。

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批所谓早期维新派人物的出现。这批人士活跃在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大都游历或出使过西方国家，有的在外商洋行里做过事，对外国资本主义文明都有切身的体验，因此思想上比一般士大夫更开放、更富有现代意识。在对待如何改良中国政治、为现代化铺平道路问题上，他们的见解比起前述诸人来，也步得更加激进、更加全面。

这里，我们选取王韬、郑观应二人作为他们的代表。先来看看王韬的改革设想。

王韬在所著《变法自强》一文中说，“今日之当变革者有四”，即：第一，“取士”。全面改革考试制度，废除“时文”，代之以各种有用之学，武科亦宜废弓刀石而代之以枪炮；第二，“练兵”。陆营、水师的训练，一律改从西法/装备上一律用枪炮、轮船，取代过去的弓矛、艇舶；第三，“学校”。广设学校书院，课题可分“文学”、“艺学”两类（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文科和理科）；第四，“律例”。要把现在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所有官员尽行裁撤，“内自京师，外至直省，大自六部，小至州县，举二百余年来牢不可破之积习，悉一

扫而弃之”。然后让那些谙悉律例的知识分子充任各级职务，定期加以考核、奖惩。^⑧

王韬的上述改革设想，囊括了政治、法律、军事和教育等主要方面，其激进程度超过前面任何一种方案。但是，王韬所提出的那套方案，特别是其要求清朝官僚集团全盘撤换的设想，作为一种改革方案（而不是一个革命纲领），恐怕是任何一位上层统治者都不愿和不敢接受的。

郑观应的改革思想同样比较激进。他认为西人立国有体有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这里所说的“用”，不妨理解为现代化在物质层面的具体表现。所谓“体”，则是指现代化的先决条件。郑观应接着说，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中国要现代化，首先要具备前提条件，也就是“求其体”，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为此，郑观应专门撰写《议院》一书，呼吁在中国设立议院。他坚信：“必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⑨

郑观应的此一改革设想，是沿着一条崭新的思路得出的。前面所介绍的若干人物，其改革主张，大致都属于“中国本位”模式，亦即在中国传统智慧所许可的范围内产生的，换句话说，都没有把国外的历史经验和现代化模式作为制订改革计划的参照系。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所形成的改革方案，其最大胆、最激进的设想，也只不过是使现行官僚集团来个彻底换班。除了科举制度这一层之外，它们对现存政治体系，提不出更多的改革办法。郑观应的设想，则超越了传统智慧的范围，他把目光投向西方经验，在甄别了西洋赖以立国之“体（或“本”）与“用”（或“末”）之后，便毫不迟疑地要把西方立国之“本”引直到中国来。在中国现代政治发展史上，郑观应算得上是一位开创“西洋本位”的思维

模式之先河的人物。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郑观应的思路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简单性。在郑氏看来，既然A现在亟需政治革新，那么就应该看看先进的B情形如何。一旦弄清楚之后，就应该拿B之所有，补A之所缺。过去我们的失败是由于“求其用而遗其体”，现在弥补之法，便应该是先求其“体”而徐图其“用”。令人遗憾的是，郑观应的这种简单的横向排比和形式逻辑，使他颠倒了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本”与“末”的位置。

我们知道，西欧各国，诸如英国和法国，走的是一条渐进的内生型现代化道路。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革命的技术进步，以及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变革，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现代化运动的根本动力。至于其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则是由这些国家的新式土地贵族或商业寡头在17、18世纪完成的。但当时他们所把持的议院或国会，跟19世纪晚期郑观应所处时代的议院是两回事。前者事实上依然是一种寡头政治，而后者则是工业革命发生后经济利益不断分化、社会结构走向多元化，导致政治参与范围日益扩大的产物。也可以说，是西欧中世纪历史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适应和转化。因此，郑观应所说的议院，与其说是现代化之“本”，倒毋宁说它是现代化之“末”。把现代化的后果混同于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这是郑观应的思维方式所难以避免的一个错误。

其次，郑观应的这套方案既然是机械地“拿来”的，所以，在晚清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下，也同样缺乏起码的可操作性。道理是不言而喻的。19世纪晚期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实质性的传统社会，经济、社会、政治面貌一如往昔。要在这样一块陈腐的土壤上，栽插一枝来自完全异质的土地之上的花朵，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

甲午战争以前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现代

化先决条件的探索，至此为此，已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清晰的脉络。

首先，70年代中期的海防筹议活动，通过本末关系的探讨，把现代化先决条件问题首次提出来。在这场讨论中，李鸿章率先打破“在传统内变革”模式，向传统政治体系的基础——科学考试制度提出挑战。这一挑战的意义，在于它有可能为现代化所必需的权力转移过程打开一道缺口。郭嵩焘直接主张国家政策应该体现工商业资本家的利益，首次提出让资本家议政参政问题。他所建议的一套现代化框架方案，兼顾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全面探索现代化条件的第一人。总的来说，李鸿章和郭嵩焘的前驱性探索，为日后中国政治改良思想的发展演变提供了范本。

接着，70年代末，以罗应旒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沿着李、郭二人的思路，提出了更全面、更彻底的现代化方案。这一方案在主张通过科举制度的改革全面更换领导阶层、完成权力转移任务的同时，强调在军事、科技、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系统的学习西方，实行全方位的现代化。可以说，类似罗应旒这样的方案，已经差不多贴近了现代化所需要的先决条件。

最后，80年代及90年代初，一批“早期维新派”人物对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作了更进一步的探索。他们的主张，一般都显得比较“激进”。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郑观应的主张一改从前的中国本位模式，树立了西洋本位的认知模式的先例。不过这些方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均缺乏可操作性。

①李家骥：《开县李尚书政书》卷六。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九。

③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

④⑤⑥⑦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62、143、136—141、170—181页。

⑧王韬：《韬园文录外编》。

⑨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五。

[责任编辑：蒋顺兴]